

编者按:中国在全球化起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,作出了哪些贡献?作为深耕战略研究与理论探索的资深学者,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、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在《全球化的中国启航》一文中,从技术、贸易、文化、制度等多视角阐述了古老的中国如何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航,以宏阔视野追溯了全球化演进脉络,深刻剖析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逻辑,为读者理解时代变局中的中国角色、把握全球发展大势提供了宝贵指引。本报分两期刊发此文,以飨读者。

全球化的中国启航(上篇)

▶ 徐伟新

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领域,通过不断强化联系与互动,形成相互依存、深度融合的动态过程。时至今日,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并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。那么全球化形成于何时?有一种叙事将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视为人类文明互联的开端、全球化的起点。实则在公元前138年,汉武帝派张骞“凿空”西域,便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系统性文明对话。自1405年起,郑和船队七下西洋,建立起横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。古老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,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南亚、中亚、西亚、非洲乃至欧洲;通过物质交换、货物流通、文化交流等,将中国理念及社会制度广泛传播,搭建起亚洲、非洲、欧洲文明互鉴的立体网络。古老的中国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航,以其强劲的东方力量最早登陆全球化的大舞台。

以四大发明为主导的技术革命,催化全球文明进程跃迁

造纸术、火药、印刷术、指南针是古代中国享誉全球的四大发明。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亚、南亚、中亚,又通过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,对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等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四大发明的传播直接改写了世界历史轨迹。

造纸术在西汉出现,用麻和丝絮等作材料,纸张质地粗糙。105年,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,造出轻便耐用的蔡侯纸,纸张逐步取代竹简和绢帛,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。日本在唐朝时期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等渠道,学习了中国的造纸技术,并将其带回日本,推动了日本造纸业的发展。造纸术向西域的传播则借助于丝绸之路。汉朝时,西域各国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,造纸术随之传入西域,一直到了中亚的波斯等地。波斯人又将其传播到西亚的阿拉伯国家。1150年,阿拉伯人在西班牙萨狄瓦建立了欧洲首个造纸厂,随后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造纸厂。造纸术为文艺复兴的知识传播提供了廉价高效的媒介。

火药的前身是炼丹术,唐代《太上圣祖金丹秘诀》记载了火药配方,称之为“着火的药”。9世纪,火药开始用于军事。宋朝设立火药作坊,系统生产火药箭、火枪等武器,南宋“突火枪”标志火器时代的开端。蒙古西征将火药传入欧洲,火药的军事化应用,瓦解了欧洲骑士阶层,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溃。火药的使用改变了战争形态,火器革命最终成为王朝换代、权力更迭的直接推手。

从东汉时期的拓印,到唐朝发明的雕

版印刷术,尤其是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,为人类知识的传播交流,为全球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。印刷术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及日本、越南等地,形成了“汉字文化圈”,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教育与科学进步。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,成为世界文明进步和全球化的重要杠杆。

指南针曾是航海时代的核心技术。中国在唐代出现人工磁化铁针的雏形,宋代将磁针与方位盘结合,广泛应用于航海。北宋《萍洲可谈》记载了阴晦天气使用指南针导航的实例,是世界上航海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。宋代航海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、印度、阿拉伯、东非的海洋贸易,泉州、广州成为国际港口。元代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记录了远达东非的贸易路线。大约12世纪末,指南针传入欧洲,葡萄牙航海家达·伽马正是依靠中国罗盘技术开辟了绕过好望角的航线。1492年,哥伦布跨洋航行发现新大陆,开启人类大航海时代。指南针的全球传播重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版图,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,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。宋代的造船技术更是领先全球。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,抗沉性远超同时期欧洲船只。这种技术优势使宋代商船广泛活跃于印度洋区域。《梦溪笔谈》记载的水密隔舱工艺被马可·波罗记录后传入威尼斯,成为欧洲造船业的标准配置。

古代中国的技术突破不仅是工具革新,更是人类文明跃迁的催化剂。四大发明成为联结欧亚非的技术链条,深刻地重塑了世界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格局。

贸易网络,从丝绸之路到全球经济联动

世界上最早的跨大陆网络和大规模海洋贸易,是中国发起的。公元前138年,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,由此逐步连接起中国与中亚、东南亚、西亚、非洲乃至欧洲的贸易网络。

中国的铸铁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亚,使大宛等国的冶铁业得以发展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,大宛“得汉黄白金,辄以为器,不用为币”,反映出中原冶金技术对西域

经济结构的改造。中国丝绸、瓷器、茶叶,特别是瓷器,更成为欧亚非大陆系统性交流网络的明星商品。公元前2世纪,汉武帝派出远洋船队驶往印度洋,开辟了南海至印度洋航线,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。明代郑和七下西洋,开启了亚非大航海,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巅峰。随之而来的是“郑和大交换”,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铁器、稻米、桑蚕、柑橘等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、南亚、东非

和欧洲,中国成为古代全球体系的终端生产者与核心市场。不仅如此,在中国商品涌入国际市场的同时,中国以主动开放的心态,积极吸收外来的技术与产品。

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物种商品的大交换,直接推动了全球的白银环流,引发了第一波的货币全球化。铜钱、丝绸一度成为东亚、东南亚的“国际货币”。元朝发行的“中统钞”是世界上最先的纯纸币流通体系,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详细记载了纸币的制作和使用。13世纪末欧洲开始模仿中国纸币,但因缺乏信用体系未能普及。到明朝推行“一条鞭法”,将大部分赋役合并折银征收,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无法由中国国内银矿满足的白银需求黑洞。日本石见银山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区之一。通过中国商人和后来

的葡萄牙人,大量日本白银流入中国,换取中国的生丝、绸缎和瓷器。西班牙在波托西银矿开采的白银运至马尼拉,与中国商人交换商品。另一部分美洲白银则被运回西班牙,然后通过欧洲商人购买亚洲商品,最终也间接流入中国。由于国内白银短缺,明朝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进口美洲白银,白银成为一个将世界各部分捆绑在一起的系统性力量。白银的流动将美洲的矿业、亚洲的制造业和欧洲的融资贸易业连接在一起,形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循环,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无法再孤立运作。可见,在16—18世纪,白银就是全球化本身。驱动这个全球白银泵的核心引擎,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。全球化是一个由东方的生产、需求和网络所主动构建的漫长进程。

人的流动,行走的全球化

欧洲大航海时代后,人的流动主要是欧洲人流向世界,与此不同,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,人的流动更多的是朝向中国。在中国,特别是唐宋元三代是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和制度包容性的文明中心,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定居、经商,甚至出仕做官。他们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,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。

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族群交融。粟特人是丝路上的“商业民族”,他们在长安、撒马尔罕之间建立贸易网络,甚至在中国朝廷为官。唐代安史之乱揭示了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。安禄山作为粟特一突厥混血,在边贸集市长大,他精通“六蕃语”,能无障碍地与中亚地区的将领和商人沟通。安禄山为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,其河北地区是唐朝与东北亚、中亚贸易的枢纽,这里胡商云集,汉胡杂居,经济繁荣,文化交融,对中央的儒家正统文化反而较为疏离。安禄山能在这里积聚反叛的资本,正是因为他掌控了这个全球化经济的通道。安禄山率领一支8000人的精锐亲军,由同罗、契丹、室韦等胡人组成,这支部队不是基于民族认同,而是基于个人效忠和利益驱动。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冲突,也表明唐朝的开放政策成功吸引了外来人才与财富,但其帝国治理模式却未能完全适应和消化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,揭示了唐王朝作为一个全球化帝国的内在张力与脆弱性。

人口的流动与聚集。张骞“凿空”西域,开通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通道,此后,汉朝使者“相望于道”,一年中往来多达十余批,少则五六批,使团规模大者数百人,小者百余。唐宋元明时期,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、泉州、扬州等港口城市,将中国的瓷器、丝绸等运往西亚和欧洲,再将乳香、没药、珍珠、象牙等运到中国。从长安、洛阳到敦煌、凉州,都有粟特商人的聚落。在文化宗教传播过程中,法显、玄奘等中国僧侣西行取经,鸠摩罗什、马可·波罗等东来。郑和船队不仅载有士兵和水手,还有翻译、医生、工匠,一些船员留在了东南亚,成为早期华侨。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,唐朝长安人口超百万。长安设有波斯邸、

粟特坊、大秦寺等机构,供外国使节、商人、僧侣、留学生等居住,允许景教、祆教、伊斯兰教自由传播,与中原文化交融形成独特的盛唐气象。

入仕为官。外国人可通过军功、科举或因特殊技能被征召,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担任官职。高仙芝是唐朝著名军事将领,高句丽人,其父为归附唐朝的高句丽将领。高仙芝后官至安西副都护、四镇都知兵马使,曾率军远征中亚。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深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,在元朝为官17年,其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。大量的色目人,包括粟特人、波斯人、阿拉伯人等,进入元朝政府担任要职。至明朝,对外政策奉行“朝贡体系”和“海禁政策”,因此,外国人在明朝的活动大幅减少,不再像元朝那样轻易地进入官僚体系核心,而是更多集中在科技交流、军事顾问、宫廷服务以及有限的民间贸易等领域。明朝以及明末清初一些耶稣会士进入朝廷,利玛窦、汤若望、邓玉函、龙华民等,参与历法修订。郑和下西洋时从东南亚带回一些幼童,其中一部分入宫成为宦官,特别是来自暹罗(今泰国)的宦官,在宫中担任翻译、侍从等职,是明朝与东南亚朝贡往来中的重要沟通桥梁。

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及,随着人的流动,疾病也开始跨大陆传播。例如安东尼瘟疫,病毒的源头来自中亚,通过丝绸之路的商队和军队传入罗马。公元2世纪,罗马帝国军队在镇压东方叙利亚的叛乱后,将瘟疫带回罗马,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量减少,重创其经济与军事实力,被认为是罗马衰落的起点之一。这是欧亚大陆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互联后的一次早期全球化灾难。再比如黑死病,14世纪蒙古帝国庞大的贸易网络和密集的驿站系统,为黑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提供了传播途径。这场瘟疫在数年内夺走欧洲很多人的生命,引发了深远的社会、经济、宗教巨变。黑死病在短时间内肆虐欧亚非大陆。黑死病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最残酷但也是最客观的证据,标志着东半球的一体化程度已经非常高,已经形成全球化的东方体系。

(作者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、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。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)